

翻译标准的调节器——翻译目的

刘正刚,肖 烨^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外语系,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翻译究竟要不要“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然而,翻译除了忠实于原文之外,还得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关注目的语文化环境等后现代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热点话题。通过以翻译目的为调节器,对忠实原文、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及目的语文化环境进行协调,可使忠实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标准。

关键词: 忠实;翻译标准;翻译目的;调节器

在当今信息爆炸时代,到底需不需要翻译标准? 如果要,是什么样的标准? “作为以‘传令知会通耳’为目的的创造性文化活动,翻译当然要有行为规则,其创造的结果也得有尺度来衡量。这规则和尺度就是翻译标准”。^[1] 然而当代翻译实践的形式远远丰富于传统的宗教及文学翻译,以原作为中心的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无法适应如此丰富的翻译实践形式。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强烈冲击下,翻译标准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抛弃,致使翻译标准的讨论陷入尴尬的局面。

一 当前有关翻译标准讨论的尴尬和局限性

忠实翻译标准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中西方传统译论首先都强调“忠实”二字。然而,传统忠实观与翻译实践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很多情况远非传统的“忠实”二字可以解释清楚,纵观中西方千百年来的翻译史,实践和理论相互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

从佛经翻译时期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清末维新派翻译家严复的“信、达、雅”都将“信”作为第一要义。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等也是对忠实的不同表述。来自西洋的“对等”论、“等值”论、“等效”论等实质上讲的也是对原文“内容或意义”的忠实。然而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忠实观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讨论,所谈及的仅仅是对原作这一翻译客体的忠实,忽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把翻译这一多元主体“集体参与的整体复杂

行为”^[2]简单地视为一种仅限于原文与译文间单一的二元关系,因而在指导翻译实践时往往不尽如人意。同时传统忠实观概念过于模糊,尽管都强调忠实于原文,但对于“到底怎样才是忠实于原文”并没有达成一致:是忠实于原文的语篇、句子、还是词语?“依实出华”、“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达到“化境”的意译还是“不增不减”的直译才是忠实的译文? 达到何种程度才忠实? 对此传统译论并未给予清晰的表述,即使偶尔提及翻译的功能、读者因素、译语的行文习惯等原文外因素,也未能将这些因素与传统忠实观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系统的讨论。因此传统忠实观在指导内容无所不包、形式丰富多样的当代翻译实践时显得捉襟见肘。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席卷之下,翻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传统译论的各个层面进行解构,颠覆了传统译论提倡的对原作的忠实,消解了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大力提倡突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后现代理论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翻译赖以立足的基石进行挑战”,^[3] 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为当代翻译研究注入了无限活力。然而,后现代理论各个学术流派只是从各自的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对别的流派重视不够,尤其未对传统研究中一些重要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同样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后现代思潮是极具颠覆性和破坏力的一种思维方式,传统翻译观在其肆

① 收稿日期: 2008-03-05

作者简介: 刘正刚,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外语系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肖 烨,女,湖南武冈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

虐之下, 原来的合理性受到摧残, 原来的确定性受到支解, 翻译研究陷入一片迷惘之中”。^[3] 解构主义突出其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作者已死的观点, 使其翻译研究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 文化学派过于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原文的摆布而易导致随心所欲的胡译和乱译, 且该学派对应用翻译的研究方面基本尚属空白; 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过分重视权力地位等意识形态因素使其翻译研究很容易步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保护主义的樊篱之中。而且, 由于后现代各派翻译思潮均极力消解原文及原作者的权威, 导致翻译过程中极易忽视原文的作用, 甚至混淆译文和原文的界限。后现代思潮给翻译研究输入新鲜血液的同时, 也向传统的翻译研究发起了剧烈的挑战, 颠覆了传统翻译的忠实观。然而在传统被颠覆之后, 后现代翻译研究在更新人们思维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片迷茫。

二 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的调节器

目的论 (Skopos-theorie) 是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心理理论之一, 由弗米尔 (Hans J. Vermeer)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根据行为理论, “弗米尔将人类行为定义为在一定情景中发生的意图性、目的性行为”; 而“翻译是基于源语文本的一种翻译行为”, “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产生的语篇”。^[4] 根据目的论可得出以下结论: 凡人类行为为皆有目的, 行为者根据具体情景选择其心目中最佳方式以求达到行为的预期目标; 因而译者在从事翻译这样一种目的性行为时, 也会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 尽量考虑一切可能的相关因素, 从而决定最适合的行为方式, 即翻译策略。这也就是弗米尔所提倡的“目的决定手段”。^[5]

目的论的提出激活了一直存在于翻译实践中却从未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 即翻译行为的目的。如圣经翻译为了传播基督福音; 广告翻译为了使商品打开客户市场; 文学翻译为了再现原文的艺术风格和美感, 给读者提供特有的审美体验等。这些翻译的目的一直存在于实践当中并指引实践的方向, 却从未得到理论界的重视及系统的研究。目的论使之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从而用以指导翻译实践, 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然而, 目的论原则的应用必须谨慎, 不可滥用, 以免翻译目的沦为某些译者胡译、乱译、任意篡改歪曲原文的借口。

诚然, 如弗米尔所言, 翻译行为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但是, “翻译发起人在提出翻译的指令要求时, 不论其期望或者要求达到的目的怎样, 有一点是根

本无法否认的, 即他总得提供一个蓝本——原作”。^[6]^[147] 没有蓝本, 翻译便成为无源之水, 预期目的就得靠创作来达成了。因此, 只要是翻译, 其创造性必然受制于原文。翻译其实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原文进行重新书写, 以原文为蓝本必然存在对原文的忠实性问题。原文是个笼统的概念, 它由语言组成, 组成原文的语言有时又蕴涵着丰富的源语文化。一篇具体的原文文本语言构成又可分为篇章、段落、语句、字词和语音等, 同时该文本必然有其独特文本特色, 也蕴涵有原作者特有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原文蕴涵的所有因素是否必须在译文中得到无条件的忠实再现呢? 当然, 如有可能, 这样的忠实是值得提倡的。但由于各种语言之间天然的差别、各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民族文化间的差异, 这类忠实只是乌托邦式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绝对的忠实只能是原作本身, 即辜正坤先生所说的永远达不到的“绝对标准”, “因为达到它, 就意味着根本不翻译一个字”。^[7] 显然将这种绝对的、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作为翻译标准没有任何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人们应该以相对的观点来对待忠实, 把忠实于原文做为翻译标准的一方面, 同时考虑译入语读者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翻译目的等因素。

译文要忠实于读者, 须考虑读者群所处环境的综合因素。译文读者通常以目的语文化为背景, 受目的语文化环境熏陶, 因而忠实于读者的阅读心里和审美习惯必须先忠实于目的语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是个相当复杂笼统的概念, 几乎包含后现代翻译研究涉及的方方面面, 如目的语民族心理思维习惯、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观等。翻译时, 这些因素都必须考虑。因此, 翻译实践时首先忠实于原文, 然后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 确定预设读者群体, 再根据该群体的具体文化环境对译文进行调整, 使译文忠实于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 易于读者接受, 达成翻译目的。由此可知翻译目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事实上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 调节了源语及源语外各因素的关系, 使翻译中各矛盾因素得以和谐统一, 译出优秀的译文。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翻译家严复并非是因为其翻译对原著亦步亦趋的忠实而在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而是其译作成功地“利用异域的意识形态颠覆了中国当时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 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和民主意识”。^[8] 严复在其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对原书所引喻设譬, 多用几意更易。如《天演论》‘导言十三·私制’中就有‘李将

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的中国事例替换原文中哈曼吊摩迪开之事”。^{[9]121}此外,通览严译《天演论》全文,译者皆以古雅文体进行译述。严译《天演论》是“严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本着特殊的目的以特殊方法移译出来的”。^{[9]117}其目的就是“为了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图存大业”。^[8]要启迪民众,首先要获得社会精英阶层的支持与认可,当时的精英阶层就是封建士大夫。因此,晚清时期自视甚高的封建士大夫便成了严复翻译时的目标读者群。“他知道,西方民主思想从根本上将是同封建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为了让封建士大夫能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这副‘苦药’,严复‘别有用心’地在这副苦药外面裹上了一层‘糖衣’,这糖衣就是‘雅’”。^[8]在此严复所用的古雅文体,忠实当时的译语文化环境,符合当时士大夫们的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成功地投其所好,达到了宣传西方民主思想的目的。同时,其译文对原文所引喻设譬“以中事易之,便于(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而且事例虽换,意义并无背于原文”。^{[9]122}严译《天演论》之中对原作所作的增、删、替、改乃至发挥,都是为投其目标读者群之所好,以便达其翻译之旨而做的一些变通之举。在此,严复在翻译目的的指引下,对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者和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之间进行了合理的协调,成就了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的伟大译著《天演论》。

翻译对原文的忠实总是介乎于过与不及之间,不可能达到对原文绝对的忠实。最大程度的忠实应该是尽量对原文进行亦步亦趋的翻译,即“不打扰原作者而将读者移近作者”;^{[6]253}最低程度忠实的译文应该尽量保留原作的内涵,形式上“尽量不打扰读者而将作者移近读者”,^{[6]253}在基本保留原作内涵的基础上,尽量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投读者之所好,使读者的阅读负担降低到最低值。最大程度忠实和最低程度忠实之间还有许多可能的居中程度

不一的忠实,译者具体如何把握,如何在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之间进行协调,以达到合格的、和谐的、真正忠实于翻译中所涉及各个因素的译文呢?翻译时,应该在基本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以翻译目的为指导,根据目的语读者群的审美心理、阅读习惯,以及目的语文化环境因素,对基本忠实于原文的译文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便可使译文在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者群以及忠实于目的语文化环境之间达到和谐的统一。因此,优秀的译文应该在翻译目的的协调之下,同时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目的语读者群以及目的语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 [1] 曹明伦. 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兼论严复的“信、达、雅”[J]. 中国翻译, 2006(4): 12-19
- [2] Snell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7.
- [3] 刘卫东. 交互主体性: 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出路[J]. 中国科技翻译, 2006(5): 5-8
- [4] Nord, G.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1.
- [5] 张美芳. 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83.
- [6]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7]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341.
- [8]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J]. 中国翻译, 2003(5): 16-23.
- [9]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文爱军)